

十四军军史丛书之一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

抗日战争史

十四军军史丛书之一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

抗日战争史

主编 马合坤
编辑 张翔
韩有善 白毓秀
杨锦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继承和发扬我
军优良传统，
以献身精神
勤学苦练新
技术，时刻准
备着，为保卫
祖国建立新
的功勋！

六十军三支題

彭波六月一日

前　　言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到现在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部队番号由决死一纵队、决一旅，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是十四军老部队之一。最近整编仍隶属第十四集团军。

正如胡耀邦总书记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视察十四军部队所作的重要指示那样，“十四军这个部队，第一，有一个光荣历史；第二，这几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立了功，也可以说立了大功；第三，现在你们还肩负着保卫大西南、保卫祖国边疆的巨大的责任；第四，你们这个军，是个大军，有四个步兵师。有这么四条，中央、中央军委对你们抱有很大的希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讲话中指出：“你们这个部队，总书记说了有光荣传统。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经过了抗日战争、打过‘百团大战’，而且是主要方向。解放战争，你们打了大仗，参加了淮海战役。最后一直打到广东、广西和云南，随后镇守云南边疆，保卫了祖国。所有这些，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概括了“决死一纵队”的光辉战斗历程，峥嵘的历史。

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编写出这个史册，对八年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表示缅怀，并对指挥这支英雄部队英勇善战的各级领导人而讴歌，用它启示后人，继承发扬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四化”奋斗！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创建新军 (1)

- 第一节 创建新军的背景 (1)
- 第二节 创建新军的经过 (5)
- 第三节 创建新军 (10)
- 第四节 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6)
- 第五节 “十二月事变” (22)

第二章 进行政治整军 (33)

- 第一节 第十八集团军关于决死队政治整军指令 (33)
- 第二节 加强党的建设 (35)
- 第三节 健全政治工作各项制度 (37)
- 第四节 进行整风学习 (41)

第三章 参加创建太岳根据地 (43)

- 第一节 参加政权建设 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45)
- 第二节 发展地方武装 壮大抗日力量 (50)
- 第三节 开展大生产运动 保障供给渡过难关 (60)

第四章 在战斗中成长..... (65)

第一节 坚持游击战 开辟太岳根据地.....	(65)
第二节 参加百团大战.....	(70)
第三节 围困沁源.....	(83)
第四节 保卫太岳根据地 参加反顽作战.....	(90)
第五节 扩大根据地 进行反攻作战.....	(106)

附 件:

组织沿革表.....	(113)
传 记.....	(143)
英烈名录.....	(192)

第一章 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创建新军

第一节 创建新军的背景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成立，是山西新军最早的一支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领导下，由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负责组建，并兼任该队政治委员。此后，部队迅速发展，由总队扩编为一纵队。相继又组建了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政卫旅等，到一九三九年底，组建起九个师旅级单位和五十个团的部队。创建这支部队，从酝酿、组建到不断扩大，完全是在党领导下，端正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因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武装。

山西新军的创建，与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山西的社会情况分不开。一九三六年，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该省五台县人，从一九一二年起就统治山西，经历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一九二八年进入蒋介石统治时期后，阎锡山先后任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平津卫戍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几十年间，阎锡山搜刮民财，经办实业，工厂银号、商店的资本总计二亿元以上，控制了山西整个经济生活。阎锡山由一个封建军阀，转向为官僚资本家，在日寇要侵占整个华北，对晋绥势在必夺的情况下，要保住实业，便成为他考虑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三五年以后，日寇步步紧逼，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相继，南京政府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侵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日寇侵略华北的罪恶行径，取得合法根据。同年底，日寇唆使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虽然阎锡山和日本军阀关系很深，早在二十世纪初，他留学日本时，就醉心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不少日本军人，同日本战争罪犯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都有交往。一九三〇年阎锡山联冯倒蒋战争失败，避居大连，常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接触，于次年八月，日本派飞机把他送回山西大同继续掌权。一九三六年一月，土肥原贤二带天津驻屯军参谋中井飞到太原，策动阎锡山搞“华北五省自治”。土肥原贤二还向阎锡山提出“借路”，假道绥远进攻外蒙。阎锡山出于必须守住晋绥土地，才能守住亿万家产的考虑，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声称：晋绥是他的防区，守土有责，不能同意日方的计划。同时，他顾虑投降日本，充当汉奸，万人唾骂，也予拒绝。这样，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逐渐尖锐起来。

摆在阎锡山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对付蒋介石。阎锡山同蒋介石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勾心斗争互相争夺统治权的历史。早在一九三〇年初，阎锡山统治华北六省市，权势空前膨胀，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激剧发展。阎锡山联络各个倒蒋派系和大小军阀，当时在太原的有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陈公博，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扶，以及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的代表，共商倒蒋事宜。于同年五月，爆发了他和冯玉祥联合倒蒋的战争，这是军阀混战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次战争，历时七个月，双方动用军队超过百万，战场绵延数千里，以阎锡山惨败下野而告终。战后，双方关系表面趋于缓和，实际是以由战争转向和平形式的明争暗斗，在阎锡山推行“十年建设计划”时，蒋介石凭借江浙财阀雄厚的经济实力，想方设法打入山西，利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向山西经济各领域渗透。阎锡山则办起垦农盐业银号、铁路银号等，同蒋介石办的银行相对抗。蒋介石要统一征收烟、酒、盐税，他以“代收税”的办法抵制。一九三三年修筑同蒲铁路，南京政府要求修标准轨，阎锡山竭力反对，力主修窄轨，并著书陈述窄轨的经济效益。阎锡山实际考虑的是，一旦有了战争，窄轨的好处是有利于他倾巢而出，不利时则可龟缩老巢据守。最后，南京政府勉强同意。蒋介石处心积虑排斥阎锡山，力图将其嫡系分子打入山西各种机构内部，收买阎锡山旧部军政人员。致使山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追随蒋介石，在山西搞河东道独立运动（汾河以东），要求归属蒋介石。加上国民党军官庐山集训时，蒋介石收买了阎锡山部下一些将领。他曾哀叹自己，“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因此，他时刻警惕蒋介石危及他的统治。

在阎锡山面前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怎样对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北平学生举行了气势磅礴的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的游行示威，扩大到全国各地。同时，党中央派人做阎锡山的工作，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遭到拒绝。阎锡山利

用黄河天险，部署重兵，筑起层层堡垒阻拦红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一夜之间突破阎军黄河防线，横扫晋西广大地区，阎军节节败退，有的不战而逃，历时七十五天的东征战役歼灭和击溃蒋阎军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更重要的是，红军东征在山西撒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不满阎锡山的统治，要求跟共产党走。阎锡山懂得，若违背全国抗战这一潮流，违背人民的意愿，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他在山西的统治基础。

摆在阎锡山面前的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这块地盘，这是他不能接受的。蒋介石要搞垮他，把山西这块地盘统一到他手里，也是阎锡山所无法容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阎锡山如果不抗日或者投降日本人，中国共产党和山西人民就要反对他，也会导致他难以继续统治山西，丢掉这块地盘。老军阀阎锡山谙于事故，看出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如果联共抗日，则既能抗日，又能拒蒋。阎锡山根据其反动的“二的哲学”，在“存在中求生存”，找到了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政治路线，就是必须与日、蒋、共三种力量折衷相处，既抗日又和日，既拥蒋又拒蒋，既联共又反共。所谓抗日、和日，就是在日寇向晋绥进攻时，必须抵抗一下。如果日本人不侵占他的地盘和财产，或者侵占后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能归还他，他就可以变“抗日”为“和日”。从某种意义上说，阎锡山“抗日”是为了求得“和日”。交替使用“抗日”或“和日”的手法，所以，他的抗日必然是很有限的。所谓拥蒋、拒蒋，是他同蒋介石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并要靠蒋的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还因蒋、阎实力悬殊，

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表示拥蒋。同时，阎锡山看到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在全国已失去人心，而他要拿起抗战这块招牌，做法必须得体，办事必须得有分寸，不能对蒋介石刺激过大。所谓联共、反共，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太大，红军具有巨大威力，公开反，反不了，只有联合共产党才能弥补自己势单力孤；用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进逼。但他为其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从不忘反共，所以他的联共也只能在某种条件下利用一下共产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联共抗日，则既能抗日又能拒蒋，是个好办法。阎锡山形容他当时的处境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三颗鸡蛋上跳舞，意思是象走钢丝绳，随时有掉下来摔死的危险。一颗也不能踩破，是说日、蒋、共，哪一方也惹不起。阎锡山就是这样在矛盾中求生。

第二节 创建新军的经过

阎锡山被迫倾向于抗战，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守土抗战”的新口号。这时，他感慨地说：“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要看谁制服谁了！”这几句话，既反映了他倾向于抗战的思想，又反映了他要使用共产党人才的做法。

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初，阎锡山派亲信郭挺一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带着阎锡山的亲笔信和巨金，到北平寻找薄一波。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人。一九二五年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委书记和山西临时省委委员。他领导过一九二五年震动太原的袭击国民党右派大本营平

民中学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阎锡山改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洗共产党人，他被迫离开山西。同年八、九月间，阎锡山下令通缉薄一波和其他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他曾秘密回到山西，当局知道后又对他下了一道通缉令，他再一次被迫离开山西。这一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一九三六年秋，经过党组织的营救，他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准备出狱。

九月下旬，薄一波在党组织营救下，同周仲英、杨献珍、韩钧、董天知等九位同志首批出狱。薄一波把阎锡山派郭挺一来敦请之事，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人徐冰作了详细汇报。

徐冰向北方局请示后，对薄一波传达了北方局负责同志的意见。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认为，阎锡山正处在动摇中，我们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做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找上门来，是个难得的机会，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打开局面。不想去做上层工作，认为阎锡山不可能同我们合作抗日，这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形势认识不足的一种表现。刘少奇还指出，当前华北和山西革命形势都很好，尤其是山西成立了“牺盟会”，阎锡山是想把“牺盟会”作为他一面旗子，但如果在山西青年中有影响、有才干的人参加领导工作，这个组织就不会有什么号召力，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正因为这样，他才派专人来邀请薄一波。薄一波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答应了阎锡山的邀请，决定回山西工作。

薄一波到达太原，考虑离开太原已近十年，需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要求把同阎锡山会面的时间推迟。通过和老同学、老朋友及进步人士交谈，了解到许多内幕情况。比较重要的情况是，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回师陕北后，阎锡山曾召集他的“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

山成立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三十四个干部委员开会，讨论日军压境，进逼晋绥，陕北红军可能再度东下，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同意或者反对，何者有利？到会者各抒己见，同意者超过半数。以后，阎锡山曾说过：“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进行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如果能坚持抗战，日本人最终还是会离开的，不能把山西让共产党一家抗战，必须自己组织一个新的能够抗战的力量。”由此看出，阎锡山正在下“联共抗日”的决心，并思索实现决心的做法，这是他以后建立“牺盟会”和新军的思想基础。

薄一波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初步得到的印象是，山西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阶层人士转向抗日，山西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资产阶级右翼联共、反蒋、抗日意向也高。他认为，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它为我们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干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

几天后，薄一波同阎锡山见面。阎对他表示欢迎，很客气地说：“欢迎你回来，国难当头，我们要同力合作，共同抗敌救亡，复兴民族。”薄一波提出：第一，这次他如回来，是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在这一点上不能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我们都做，不利的事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所用的人，必须保障安全。阎锡山一一首肯。最后薄一波提出，还得找几个朋友一块来工作，需要离开太原几天，阎也表示同意。

薄一波回到北平，将山西之行向北方局作了详细的汇报，他提出

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一、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提阎锡山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二、不怕到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聚积力量，决不做“清客”，决不“抬轿子”。四、牢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含糊。薄一波还要求，加派一些同志一起去山西工作。北方局决定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同薄一波去太原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从组织上还决定，成立山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名称叫“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这一公开的委员会，由薄一波负责，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还成立秘密的山西工作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不发生横的关系。公开的山西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人组成，书记薄一波（以后又增加了牛荫冠、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徐荣）、傅雨田、刘亚雄、谷景生十一人，共十六人）。

薄一波等在北平监狱在押期间，狱中党支部曾组织大家学习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精神，这次会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以及“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次重温文件，又学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使他们加深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并联系实际，讨论了到山西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上述工作方针的确定，组织的建立和策略思想的准备，对他们后来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到达太原，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而是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来山西的。当阎锡山要按“上宾”规格，规定月薪二百元时，薄一波表示拒绝，说是来帮助做好事的，不是来做客，不要高薪。他们懂得，做“清客”地位虽高，月薪虽多，但没有实权，做不了实事；反之，地位低一些，但有实权，能干些实事。阎锡山身旁的梁化之、郭挺一等人，月薪六、七十元，地位也不高，但实权不小。最后阎锡山决定，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牺盟会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拿秘书薪水。这件事使阎锡山很满意，认为选对了人。就这样，薄一波等进入阎锡山内部，逐步地与阎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这一具有山西特色的“官办”“群众性抗日组织”，虽然一度在国内外引起一定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作为。十一月，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参加领导工作后，就向阎、梁明确提出，牺盟会这样下去，不能胜任抗日救亡工作，必须进行改组。经他们同意后，总会常委由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七人组成，执行委员有二十二人组成。改组后的牺盟会，面目一新，工作很快活跃起来。

不久，阎锡山主持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董天知、宋劭文、张文昂、刘岱峰，以及阎的老部下和核心人物赵戴文、梁化之、邱仰浚、傅佑承等。在会上，阎锡山提出“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叫大家讨论，他每天都来主持会议，听大家发言，但不表态。他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接连讨论这个问题？用意是什么？是不是想成立一支军队？薄一波反复在琢磨着。经过公开工作委员会研究后，决定让董天知试探一下，董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在日军进逼山西情况下，不成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起来的进步军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的入侵，因此，建立进步军队是当务之急。阎锡山听后虽没有表态，但脸上却流露高兴的神色。他回去后，对赵戴文、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二十多岁，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真了不起。这样，公开工作委员会摸清了阎锡山的意图，他是想成立一支部队，也正是我们主张和竭力争取的，要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创造条件。

第三节 创建新军

以薄一波为首的公开工作委员会，在摸清阎锡山要建立一支武装部队的意图后，加紧了牺盟会的工作，为创建新军准备条件。薄一波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一批青年学生举办“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学员经短期训练后即派往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并在各县建立牺盟会组织。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起名叫“山西抗日救亡宣传队”，阎锡山认为不妥，改名叫“山西省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薄一波考虑，只要做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可以接受这个比较“灰色”的名字。训练班计划招收两批学员，

每一批一千人，采取考试录取的办法，招收了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不满现状、具有革命精神的小学教师，外地进步青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1）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地把亡国危险告诉给民众，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2）发展牺盟会员；（3）选择会员中民族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经过一段工作，牺盟会有了大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为创建新军作了最初准备。

军政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是军政训练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为实现山西地方当局提出武装三十万国民兵计划而设立的，负责培训基层干部。薄一波等利用这个原有机构，在掌握了学员招收条件和进行政治训练内容之后，使之面目全新。相继，又成立了“民众干部训练团”。军政训练班开始只有五个连，以后扩展到十二个连，其中包括一个女生连。民训团有七个队。在这两个单位学习过的约有三千人左右，为后来建立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训练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为成立革命的抗日新军，准备了一大批军事、政治兼优的干部。

一九三七年四月，建立了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分设于临汾、大宁、平定、寿阳、原平、忻县、太谷、祁县、平遥、运城，有学员近二万人，其学员主要是本省青年。民训团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他们成群结队地从二十二个省市涌到太原来，尤以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的青年为最多，也有不少东北的流亡青年。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民训团成员的政治质量较高，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简史》中作了如下记载：“（1）所有学员都是牺盟会员；（2）都不是为升官而来，而是为救亡而来；（3）为了创造抗战的新的国民军，因此它的训练组织自不能与旧的任何军事学校、干部学